

欧洲移民问题的形成 与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

宋全成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20 世纪末, 欧洲共经历了四次移民大潮, 使欧洲越来越成为事实上的移民大陆。大量的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并没有融入欧洲主流社会, 而成为边缘性的少数民族群体, 因此, 形成了一系列的移民社会问题和移民政治问题。欧洲极右翼政党及时抓住了选民关心的移民问题, 高举反移民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大旗, 赢得了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 从而在西欧国家的政坛上异军突起。

关键词: 欧洲移民; 移民问题; 极右翼政党; 反移民; 种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D523.8、K5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839(2005)06-0092-08

Causes of European Immigration and the Rise of Arch-Rightist Political Parties

SONG Quan-che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P. R. China)

Abstract: The period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until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witnessed four waves of immigration in Europe, which turned Europe into a de facto continent of immigrants. However, a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especially those who immigrated to Europe illegally, were not mainstreamed, and they became marginal minority groups instead, thus causing a series of immigrant problems. The arch-rightist political parties in Europe taking timely advantage of the immigrant issues the electorate were most concerned about won the wide support of people from middle and lower middle strata and rose up on the political arena in Europe due to their anti-immigration, nationalist and racist attitudes.

Key words: European immigrants; immigration; arch-rightist political parties; anti-immigration; racism

收稿日期: 2005-03-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欧洲移民问题与欧洲一体化”(03JD810003)和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长基金项目“欧洲移民问题研究”(12110052182065)之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宋全成(1964-),男,山东青岛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站博士后,山东大学欧洲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欧洲移民问题、国际政治。

在今日西欧,与社会经济发展滞涨相联系的日趋强烈增长的外来移民,越来越成为日益严重的移民社会问题,在经济发展、劳动就业、福利政策、社会安全和文化冲突等方面,对西欧现代福利国家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特别是90年代以后,作为严重社会问题的移民问题,又越来越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反对外来移民成为西欧国家的极右翼政党竞选的有利武器,西欧极右翼政党迎合中下层人民的某些社会心理,紧紧抓住移民造成的社会问题大做文章,并屡获成功。20世纪90年代以来,极右翼政党在欧洲政坛上掀起了“第三次高潮”^[1],成为西欧政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1994年,由新法西斯政党演变而来的意大利全国联盟进入内阁,这是冷战后极右翼政党首次登上执政“宝座”。1997年,法国国民阵线在勒庞率领下,在议会选举中获得15.5%的选票,从此法国政坛左、右、极右三足鼎立之势开始形成。2000年2月,海德尔领导的奥地利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在选举中以高达27%的选票获胜组阁,引发了欧盟14国对奥地利实施联合制裁。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在2002年法国总统第一轮大选中以17.94%的得票率赢得大选,而向得票率19.6%的法国传统右翼候选人、总统希拉克发起了挑战,强烈震撼了整个欧洲政坛。2002年4月下旬,刚成立仅两个月的荷兰“富图恩名单党”在议会选举中,一跃成为荷兰的第二大政党。以反对外来移民为旗帜、采取取悦于大众的、蛊惑人心策略的欧洲极右翼政党的迅速崛起,迫使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欧各国对极右翼势力予以更大的关注。本文拟就欧洲移民问题与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的内在关联问题进行研究。

一、欧洲移民问题的形成

1. 欧洲移民的进程和移民现状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开启的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一直持续到今天,欧洲的移民进程大致经历了以殖民地移民、工作移民、冷战避难移民和回迁移民、非法移民为特征的四次移民大潮。第一次移民大潮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以欧洲国家殖民地宗主国人民回迁和殖民地移民到西欧宗主国为特征的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移民;第二次大潮是20世纪50年代初到1973年,以招募外国劳工为特征的工作移民;第三次大潮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冷战体制背景下的以避难和经济难民为主要特征的来自于原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第四次大潮是从冷战结束的1990年到今天,以回归西欧为特征的来源于原东欧国家的移民、接纳南欧战争难民和非法移民大量入侵为特征的移民。经历了长达50多年的发展,西欧国家的外来移民的数量在急剧地膨胀和上升。^[2]据欧盟有关研究专家估计,目前生活在整个欧洲的移民总数在5600万至6000万之间(包括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移民),其中包括300万至400万非法移民,而且非法移民以每年增加50万人的速度高速增长。作为欧洲最大的3个移民国家,德国、法国和英国境内的移民数量占全欧外来移民总数的2/3。截至2000年12月,德国境内的移民人数达到730万,法国460.8万,英国287.5万。从移民占本国人口的比例来看,名列前三位的分别是德国、瑞士和奥地利,其外来移民人口均超过了本国人口总数的10%。在几个最大的移民接纳国中,德国的最大移民群是土耳其人,有250万。法国的第一大移民是来自马格里布的阿拉伯人,人数近400万。意大利的合法移民有25万,主要来自摩洛哥、阿尔巴尼亚、菲律宾等地。荷兰移民主要来自印尼、苏里南、土耳其、摩洛哥等,其中以印度尼西亚人最多,有40多万。北欧国家的移民则主要来自北美洲和欧洲其他国家。关于欧洲的移民来源,普通劳工主要来自三个区域:中国、越南、老挝、印度等东亚、东南亚国家、马格里布(北非沿海地区)和西非沿海、土耳其等西亚国家。高技术人才则来自亚欧大陆的北部地区。在所有的外来移民中,阿拉伯人人数最多,约有1000万-1500万,他们主要来自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家。^[3]

2. 欧洲移民社会问题的形成

我们首先需要确定欧洲移民问题的内涵,在这里,如下两个概念需要做一下说明:欧盟移民问题与欧

欧洲极右势力卷土重来. <http://www.china.org.cn/23/04/2002>

洲移民问题。尽管欧盟目前还没有完全涵盖欧洲地区,但是,欧盟雄心勃勃的东扩计划的实施表明,欧盟不仅将涵盖整个欧洲地区,而且像土耳其这样的跨越亚欧大陆的国家也将纳入欧盟的版图,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欧洲移民问题也就是欧盟移民问题。在欧盟东扩之前,所谓欧洲移民问题主要是指西欧国家的移民问题。因此,当今天我们说欧洲移民问题时,依然主要是指欧盟移民问题。外来移民在欧洲的大量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并不是所有的外来移民,都构成移民的社会问题。显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移民,由于其政治文明、经济发展水平、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等因素的一体化,而不会产生作为社会问题的移民问题。真正使移民问题成为社会问题的欧洲的移民只能是如下两类:一类是在欧洲的、特别是在欧盟地区的来自于原东欧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合法移民;另一类是来自于欧盟以外的、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非法移民和难民。从西欧战后发展的历史来看,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启动,欧洲移民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社会问题,而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逐渐在西欧大陆的上空散尽的时候,冷战的阴云重新笼罩欧洲。处于社会和经济重建以及国家安全的需求,从50年代到70年代,西欧主要国家相继从其他国家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参与社会和经济的重建,同时,处于冷战需要和人道主义的要求,西欧国家接纳了来自于原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的难民(包括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70年代以后,伴随着全球性的经济滞涨和世界石油危机,由于大量的移民存在和进入而诱发的社会问题,逐渐凸现出来,并最终成为严重的移民社会问题。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层面上,大量的移民(包括难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在西欧的存在,迫使欧盟各国花费大量的金钱,处于人道主义的原因而安置这些移民或者将其身份合法化。这种移民安置的负担和合法化也对西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障碍。对待非法移民问题,西欧各国的政策并不完全一致。因此,由申根协定国提供的人员、技术、资本、货物的自由流动,也为非法移民的畅通无阻提供了便利。面对非法移民,西欧各国政府处于人道主义原因,不得不投入巨额资金给予安置,同时在非法移民的政策上也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们并不希望低层次的非法移民,因此,西欧各国收紧移民政策,打击非法移民;另一方面,一些特殊领域如建筑行业、低层次的服务行业等,由于本国公民不愿意从事这些行业的工作,因此,引进这些低层次的移民又是必需的。于是,在某种意义上又默许了非法移民的进入和存在。西欧主要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相继通过加入国籍和身份合作化行动,使非法移民成为本国公民或合法居留。显然,大量非法移民的存在和安置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从而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而且这些低层次的简单劳动力,也不利于西欧经济的持续稳定地增长。

第二,在社会福利的层面上,欧洲移民对欧盟的福利国家制度形成了严峻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欧的工业化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和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而先后进入了福利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却在大量增加,西欧各主要国家也相继成为非典型意义上的移民国家。近几十年来涌入欧盟的难民数量也随之猛增,使欧洲各国背负上沉重的负担。面对国际化的移民浪潮,西欧国家,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大众层面,无论是政府官员、企业家,还是一般的公务员或雇员,人们处处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移民的存在和移民对福利制度及政策的冲击,从而“发展出了一种危及自身安全的感觉,人们普遍感觉到‘福利国家之船已经满了’。”^[4](第441-444页)]福利国家的人们再也不能负担起更多的移民。

第三,在社会就业的层面上,欧洲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对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尽管西欧移民在西欧各国的失业大军中历来占主导,例如法国目前的失业率为9%,而移民的失业率高达22%。德国移民的失业率是16.4%,比德国人高出一倍以上,有工作的移民大多数也是从事季节性工作或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作。荷兰移民的失业率是当地人的3倍,而且多数是长期失业。但是,大部分西欧人和某些政党依然认为,大量移民的存在,对本国公民的劳动就业空间产生了强烈的挤压作用,使本来就紧张的就业市场更加紧张不堪。这也为极右翼政党利用这一社会事实,宣传其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反对外来移民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争取选票,提供了事实依据。

第四,在非传统国家安全层面上,大量移民的存在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缺乏有效的一体化的社会融合政策,在西欧没有很好的社会融合和一体化的移民及其后代,由于在社会教育、就业、

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上遭受歧视,因此,与西欧人相比,更容易走上犯罪道路。仅以法国为例,法国移民的绝大部分是北非移民,尽管法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移民政策和一体化的社会融合政策,但是,由于生活贫困、缺乏教育和普遍的高失业率,他们的后裔中存在着严重的青少年犯罪和吸毒。据统计,1994年在法国犯罪的青少年中,有55%属于北非裔,在吸毒的青少年中他们占了43%。^{[5] (第37-38页)}在荷兰,同本地的青年人相比,移民的后代由于比较封闭,家庭教育相对欠缺,不少人走到街上闹事,或是干起入室盗窃等勾当,成为一代“问题少年”。这进一步加深了当地居民对外来移民的成见。这也激起了种族主义者对外来移民的仇视和暴力行为。以德国为例,据德国内务部统计,1992年德国发生2544起仇外暴力事件,1993年又发生1609起,2000年发生了德国统一后历史上创纪录的15651起排外暴力犯罪案件,^{[6] (第24页)}西欧其他主要移民国家情况也大致如此。当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威胁逐渐消失的时候,以移民问题、特别是非法移民问题为基本内容之一的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威胁,又重新摆在了西欧国家政府和人民的面前。

第五,移民文化与西欧国家的民族文化和基本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的冲突。由于西欧国家缺少像美国、加拿大那样的社会融合和一体化的社会政策,导致多数移民群体不能融入所在国家的主流文化,而西欧这块最早产生民族国家的大陆,民族文化、民族情感、民族认同感又特别强烈,这就导致移民文化与所在西欧民族国家主流文化和基本价值观的激烈冲突。仅以西欧穆斯林妇女是否应戴头巾为例,在法国和德国,不仅社会大众参与了这场讨论,而且政治家也卷入其中。小小的包头巾,竟让欧洲许多国家法院和政府忙得不亦乐乎。在法国,这个问题已经争议了14年,法国国民议会于2004年2月10日以494票赞成36票反对的投票通过了面纱头巾法,禁止学生在公立中学穿戴伊斯兰面纱、十字架和犹太人的小帽等具有明显宗教标志的服饰。在德国,巴符州的三级法院都判决穆斯林妇女不能戴头巾。德国的16个州中,有7个州决心制订一项禁止穆斯林女教师戴头巾上课的法令。德国总理施罗德于2003年12月20日在《图片报》星期日版上也明确表示,赞同禁止女教师在国立学校包头巾。他说:“为国家工作的公务员,其中也包括女教师,不应该包头巾。”

二、欧洲极右翼政党及其在欧洲政坛上的崛起

当代学术界对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分类,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学者认为,欧洲极右翼政党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三类^[7]:第一类,是继承了法西斯主义衣钵的传统的极右翼政党,例如意大利的“三色火焰”、“法西斯与自由”,德国的“国家民主党”。第二类,是后工业时代出现的法西斯主义色彩并不明显的、极端主义的极右翼政党。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德国的“人民联盟”、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和比利时的“佛莱芒集团”等。他们通常是以维护民族主义或国家利益、反对外来移民为旗帜。这类极右翼政党已经成为当代欧洲极右翼政党的主流派别。第三类,是“新右翼政党”,也有人称之为“民粹主义”政党。瑞士和丹麦的“人民党”以及挪威的“自由党”都属于此类。这类政党以国家、民族及平民利益为号召,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8]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欧洲极右翼政党主要有如下三种类型:一是新法西斯主义的政党,他们赞成20世纪30-40年代的纳粹和法西斯运动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维护传统的法西斯主义,甚至公开打出法西斯的徽志;二是少数公开推行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政党,有的产生于20世纪70-80年代的反对外来移民的排外运动。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出现的极右翼政党,他们拥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反对现代福利国家的税收政策。^{[9] (第4页)}无论哪种分类,欧洲主要的极右翼政党共21个,分布在13个国家。就性质而言,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政党只有6个,在抗税运动中产生的政党是3个,而具有强烈排外主义性质的政党多达13个。^{[10] (第16页)}

在这里,我们无意全面分析欧洲的极右翼政党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和党的纲领,仅对与欧洲的移民问题相关的理论、观点以及他们是如何利用欧洲移民问题,赢得选民的支持,而在欧洲的政坛上迅速崛起

的现象进行探讨和分析。那么,欧洲极右翼政党是如何利用欧洲移民社会问题,而在欧洲政坛上异军突起的呢?

第一,欧洲极右翼政党利用西欧国民对日益增长的来自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量难民和非法移民存在的恐惧和排外心理,高举“欧洲人的欧洲”的鲜明的排外主义大旗,赢得了选民的信任。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参与西欧国家的社会经济建设而受到西欧国家国民热烈欢迎不同的是,80年代以后,大量的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战争难民和经济难民大量涌入西欧,凸现了移民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突出表现在,由于受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社会改革迟缓等因素的影响,欧盟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持续走低。1994年,欧盟经济增长率只有2.4%,1995年为3%,1997年为2.6%,1999年为2%^{[11](第5页)},2000年的GDP增长率为2.8%^[12]。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使欧盟各国的高失业率、高税负、高债务等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经济低迷无力支撑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这一矛盾直接导致公共开支与社会福利开支压缩,诱发治安、住房、社会福利等诸多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大众对政府移民政策的不满情绪,并对外来移民产生排斥感,形成排外主义的土壤。这可以通过有关的民意调查集中反映出来。2002年德国波斯坦大学在柏林附近的前东德地区对数千名青少年进行了社会调查,结果发现,有55%以上的青少年有仇视外国人的情绪,而在5年前这一比例仅为45%。即便是在勃兰登堡州这样外国人不多的地区,社会大众的排外主义情绪依然非常强烈。^[13]不仅德国是这样,整个欧盟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欧盟于200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欧洲人近年来对外来移民越来越反感,持不欢迎态度的人在2000年占欧盟总人数的38%,比1999年的26%约高出一半,而1992年的这一比例仅为15%。正如欧盟有的学者所说,排斥外国人,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欧洲极右翼政党,顺应了欧盟国家社会大众的这种排外主义心理,极力宣传民族主义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新形式——“欧洲人的欧洲”,排斥外来移民,从而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德国的共和党人党的杂志《欧洲民族》公开主张欧洲的爱国主义,应建立一个独立于非欧洲的欧洲。认为,欧洲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独立的拥有特别的民族和文化特征的大陆,欧洲各民族享有共同的“欧洲价值”、“欧洲文化”和“欧洲文明”,就地理区域而言,土耳其不属于欧洲国家,因为欧洲结束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法国极右翼民族阵线领导人勒庞在1993年国民议会的选举中公开宣布,为创立一个“欧洲人的欧洲”,我们应当从这样一个原则开始,民族国家的欧洲只能包括那些拥有共同文明的欧洲国家,他们从根基上是受基督教和希腊文化的影响(因此,欧洲排斥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10](第17页)}基于这种对欧洲文明的界定,德国共和党人党和法国的国民阵线都对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移民充满了仇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其掌握的新闻媒体,大量报道了“避难权力的滥用”,导致像洪水一样的大量移民泛滥的社会新闻,进一步挑起了民众的排外主义情绪。1992年9月,欧洲极右翼在欧洲议会设立的欧洲人权和技术小组,针对外国人的暴力、同时也对外国人(移民)的暴力行为起草了一个决议,认为,要保持欧洲文明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就必须完全禁止向欧洲共同体国家移民、并遣返大多数经济难民和非共同体国家的公民,只有这样,才能终止欧洲社会大众的排外情绪,才能防止欧洲被亚洲和非洲殖民化。^{[10](第166-167页)}极右翼政党的上述主张迎合了部分社会大众的排外主义情结,因此,欧洲极右翼政党在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中,获得他们的支持,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二,欧洲极右翼政党利用大量的难民、特别是非法移民的涌入欧盟而加剧的、日益严重的社会福利、住房、劳动就业等社会问题,宣扬极端的民粹主义,从而使欧洲国家的社会大众心理中潜在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死灰复燃,使部分社会大众、特别是中下层大众转而支持极右翼政党。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移民对欧洲社会经济的重建和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涌入西欧,使欧洲各国背负上沉重的负担。80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时,欧盟各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接收了大批来自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难民。到90年代以后,这些难民仍然滞留不归,加之欧洲每年接收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数也在不断增长,因此,就导致留在欧盟各国的政治难民数量与日俱增。有关材料显示,2000年,欧盟国家共接到避难申请约32万份,其中英国就占7.7万份。2000年在英国申请难民资格的人数达到破纪录水平,在所有欧盟国家中位居首位。然而,能够申请到避难的人数仅占每年偷渡到英国的实际人数的一小部分。^[14]90年

代以后,西欧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大多数政治移民并不是因为某种“政治”原因而来,而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享受高水准的物质生活才蜂拥而至。于是西欧各主要国家修改了政治避难法,收紧其接纳政治难民的移民政策。这一趋紧的难民接纳政策,暂时减少了政治难民的接受数量,却大大刺激了非法移民的高速增长。西班牙近几年成为拉美及非洲非法移民的目的地。虽然西班牙的移民人数比例还不高,仅占总人口的 2.5%,但非法移民的数目增长速度惊人,已从 1999 年的 10000 人增加 2001 年的 250000 人。意大利有 7000 多公里海岸线,2001 年就有 20000 非法移民抢滩。贝鲁斯科尼出任总理后提出:“意大利决不当漏勺。意大利不再宽容,仅 2001 年上半年就赶走了 40000 非法移民。英国是非法移民的首选国家。这不仅因为英语是多数移民掌握的惟一外语,还因为避难者在英国的待遇最好,等待期超过 6 个月即可打工。加之英国没有严格的身份证检查制度,因此,非法移民在英国很少受到监控。据欧盟有关专家估计,每年大约有 50 万外国人非法进入欧盟。难民和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造成住房、医疗、失业救济和技能培训等方面的额外负担,加剧了日益严重的社会福利、住房、劳动就业等社会问题。同时,欧盟主要国家为了解决本国劳动力短缺问题和非法移民问题,时常采取“大赦”、“身份合法化运动”和“加入国籍”等措施。法国从 1990 年到 1999 年,先后有 55 万人加入了法国国籍,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荷兰等国也相继有大量的外国人加入国籍,导致本来就紧张的社会福利开支捉襟见肘。为了削减过高的社会福利开支,减少财政赤字,欧盟各国政府纷纷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降低社会福利的水平,并在住房、就业等方面给予一些加入国籍的外国人以同样的待遇,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一部分中下层社会大众的切身利益,不少西欧民众日益担心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从而使西欧国家民众社会心理中潜伏的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潮明显抬头。欧盟 2000 年的一次调查显示,66% 的公民承认自己“有些种族歧视心理”。而法国的一次调查亦显示,92% 的人认为法国普遍存在种族主义,2/3 的人自称有种族主义倾向,仅有 10% 的人表示可以与移民和睦相处。^[15]这些“对社会不安全和相对被剥夺的愈加不安”的中下层社会民众,其潜在的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就特别容易受到激进右翼演讲的诱惑。^[16]“民粹主义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惟一合法性源泉,这就要求在社会中实行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地纳入统一的政治进程之中。因此,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实现过程;稍有不慎,民粹主义就会流变为权威主义。首先,长时间的全民总动员很难在正常的制度框架内完成,因而必须借助于某些非常的手段,如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强制性的舆论统一等;其次,普通大众在特定情况下通常会成为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盲目顺从这种非理性的大众意识,不仅可能有损其长远利益,而且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政客所利用,使大众被这些政客所操纵,成为其专政独裁的手段。”^[17]而欧洲极右翼政党,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及时打出了维护本国民众利益的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大旗,努力使自己的政党成为社会下层民众的代言人,从而赢得了社会下层选民的广泛支持。以反移民和反穆斯林起家的荷兰富图恩主张,“荷兰是荷兰人的荷兰”,应关闭荷兰对外国人的边界,停止移民,必须将荷兰的移民人数从目前的每年 4 万人降到 1 万。法国国民阵线主张“法国属于法国人”,在住房、就业、社会救助等各项社会事务中应给予“法国人优先权”,取消一切移民的家庭团聚政策,取消外籍人士自动获得法国国籍的相关政策等。德国国家民主党和共和党公开主张“劳动位置应留给德国人”。奥地利自由党海德则提出了“新爱国主义”,“只有 800 万人口的国家却有 100 万外国人,首先应该尊重国民才是”,主张奥地利人民回到自己的国土上,为了民族利益,同“移民”(外国人)作坚决的斗争。^[18]由于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潮的彰显,欧洲极右翼政党无一例外地获得了社会中下层民众、特别是一向被视为传统左翼政党的支持者——工人的支持。据统计,在法国国民阵线、比利时佛来芒集团、丹麦进步党、德国人民联盟和奥地利自由党的支持者中,工人所占比例分别为 24%、24%、34%、41% 和 35%。^[19]另据统计,1999 年,奥地利的男性选民中有 32% 的人投票给奥地利自由党,它的蓝领工人支持者占整个蓝领工人的 48%。2002 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之后,《费加罗报》以“究竟谁投了勒庞的票”为题报道说,从得票率上来看,原先属于传统左派阵营的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及小商人,这次大批地倒向极右势力,投勒庞票的工人竟占了工人总数的 30%;20

“人口赤字”与高失业率. http://news.163.com/editor/020829/020829_508362.html

%的农民也投了勒庞的票;手工业者及小商人占 19 %。

第三,欧洲极右翼政党利用在欧洲国家的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难民而产生的犯罪率上升、移民与本国国民的冲突、人口走私等社会动荡,攻击执政党和政府,赢得了一些社会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尽管西欧国家的社会犯罪,并不全是由外来的移民引起的。但是,处于社会边缘化的外国人,特别是非法移民,由于文化、宗教信仰以及生活习俗的不同,一些外籍移民难于融入当地社会,再加上其社会生存条件的恶化,因而参与社会犯罪的比率,要远远高于本地公民。一些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滋事生非,扰乱治安、打架斗殴、偷盗抢劫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同当地人产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引起当地人的不满。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由于西欧移民问题的日益严重,移民介入有组织的社会犯罪如毒品走私、人口偷渡、跨境盗车、贩卖人口、色情犯罪和恐怖活动问题,也日益突出。依据欧洲刑警组织的报告,2001 年,欧洲刑警组织记录在案的有组织犯罪案件高达 23015 起,其中 51% 是毒品走私案件,17% 是非法移民案件,9% 是跨境盗车案件,上述案件与外来移民都有相当程度的关联。大量的外来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的存在,对西欧国家的社会治安构成严重的威胁,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欧洲极右翼政党紧紧抓住移民与社会治安的恶化这一社会问题,大造舆论,将社会治安的恶化完全归咎于外来移民。客观而言,“9·11 事件以后,欧洲民众的社会恐惧感陡增,较以前更加关注社会治安问题。在 2002 年的法国大选中,有 64% 的选民明确表示,能否解决恶化的社会治安问题是他们的首选。勒庞在竞选纲领中大做“制止犯罪”的文章,迎合了选民的胃口。在西欧,近几年来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青少年暴力犯罪案件急剧上升,仅在巴黎,近年来的暴力抢劫案就上升 19%,武装抢劫案上升 27%,2002 年法国有十几座城市历史上首次实施儿童宵禁法。勒庞巧妙地将治安恶化与涌入的北非青年移民联系起来,反复强调二者之间的紧密和直接关系。他的这种“犯罪与移民存在必然联系”的观点,得到了很多法国本地人的认同。^[19]极力主张移民与社会犯罪相连、“赶走移民,恢复铁腕统治”的欧洲极右翼政党,无一例外地赢得了许多选民的支持,赢得了大选的胜利。2001 年,意大利全国联盟党加入中右联合政府;1999 年,瑞士人民党成为议会中第二大党;2001 年,丹麦人民党成为议会中第三大党;2002 年,奥地利自由党跃居国民议会第一大党;2002 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国民阵线获得了 18% 的选票;2002 年,极右翼的富图恩名单党成为荷兰议会中第二大政党。

第四,欧洲极右翼政党充分利用社会大众传播媒体,广泛传播以“阴谋理论”为代表的纯化民族文化理论,反对移民文化,主张主流文化,迎合了社会中下层选民的心理。尽管欧洲的政治上层和社会大众层面,广泛倡导的是多元文化,但在很大的程度上,社会中下层民众所认可的所谓的多元文化,仅仅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也就是说,欧洲民族国家以外的宗教和文化,往往是被看作是外来文化。由于欧洲国家在接受外来移民方面缺乏一体化的社会融合政策,因此,外来移民往往较好地保持了本民族国家的文化。特别是受殖民地和后殖民因素广泛影响的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以及受客籍劳工政策影响的德国,其外来移民多来自深受伊斯兰宗教文化影响的阿拉伯国家,而且居住相对集中。因此,较好地保留了其语言、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而成为边缘化的非主流文化。这与欧洲国家的主流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上产生了冲突。当大量的每天街道上行走的阿拉伯妇女头戴头巾、犹太人头戴圆帽,出现在西欧国家人们面前的时候,在文化的价值趋向以及对基本人权的理解上,主流文化便与非主流的外来文化产生碰撞和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事实了。为此,法国议会以 494 票赞成,36 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禁戴头巾法”,规定,公立学校的学生及教职员工禁止穿戴或者佩戴有明显宗教标志的衣物。法案是由国民大会上各党派代表提出的。他们认为实施这样的法律是为了捍卫共和国纯洁性,并体现其主流的价值观,即共和国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彻底实现政教分离。德国的某些州也通过了相似的法律。欧洲极右翼政党,充分利用社会大众对外来文化的恐惧和厌恶心理,提出了“阴谋理论”和主流文化理论。德国的极右翼理论家提出了“阴谋理论”,认为,目前“世界犹太人”的权力中心是美国和以色列,其目标是统治世界,所用的手段是多元民族政策和全球化。该理论认为犹太人和穆斯林想要控制欧洲,目前在欧洲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人,已构成了对欧洲文化和白色人种的极大威胁。他们把“民族”和“种族”当作政治认同的最高标准,人权和公民权则被置于从属地位。他们强调民族和种族的“纯洁性”,因此,坚决反对与民族或种族的融合及同化,尤其是反对与非欧洲人或非白种人的融合及同化。另外,欧洲缺乏根深蒂固的种族融合传统,且有着强烈的

文化和种族优越感,对移民文化抱有排斥心理,特别是“9·11”事件的发生更强化了西欧民众对其他种族、特别是穆斯林民族的偏见^[20],在这种背景下,荷兰极右翼政党——富图恩的名单党及时提出,歧视同性恋者和妇女权利的伊斯兰教是缺乏宽容精神的“落后的宗教”,甚至要求修改禁止种族歧视的荷兰宪法第一条^[21]。这些主张,无疑增加了以排外主义为旗帜的极右翼政党的诱惑力和吸引力。西欧其他国家的极右翼政党的主张与荷兰的极右翼政党的主张大体相似,无一例外的是,欧洲极右翼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全都赢得了选民的理解和支持。

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除了移民因素以外,还有社会、经济、政党政治、欧洲文化、一体化与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因篇幅和主题所限,在此不再论及。有关西欧极右翼政党的发展前景,笔者将在其他论文中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 [1] 让·伊夫·加缪. 欧洲的极右翼 [J]. 北京: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1, (03): 48-49.
- [2] 宋全成. 欧洲移民问题与欧洲一体化: 以德国为例 [J]. 北京大学学报: 2002, (1): 95-101.
- [3] 陈源川. 排外势力的出气筒, 欧洲移民日子越过越难 [N]. 环球时报, 2002-05-30.
- [4] Weiner, Myr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ienna: 1995.
- [5] EU's Committee. The EU member States and Immigration in 1993/1995. Brussel: 1996.
- [6] 姚宝, 过文英. 当代德国社会与文化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7] 田德文. 欧洲极右翼势力的政治化趋势 [N]. 北京: 光明日报, 2000-12-20.
- [8] 张英武, 陈永亮. 当代欧洲极右翼政党分析 [J]. 贵阳: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2): 33-36.
- [9] Simon Hix and Christopher Lord,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Micanilan Press Ltd, 1997.
- [10] 李景治, 张小劲. 政党政治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 [11] 白英瑞. 欧盟: 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
- [12] 陶涛. “新经济”对欧盟经济增长的贡献 [J]. 北京: 世界经济, 2001, (12): 88-93.
- [13] 庞台坊. 移民问题惹翻欧洲 [J]. 北京: 新闻周刊, 2002, (20): 59-61.
- [14] 刘桂山. 非法移民问题困扰英国政府 [N]. 新华社, 2001-09-06.
- [15] Kurt Richard Luther: “The FPO: From populist protest to incumbency”, Right-wing extremis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eter H. Merkl and Leonard Weinberg (eds), London: Frank Cass, 2003.
- [16] 李悦昌. 当前西欧极右翼势力崛起的原因探析 [J]. 工会论坛, 2003, (5): 108-109.
- [17] 傅金铎, 张先义, 沈桂萍. 国外主要国家政党政治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1.
- [18] 陈宣圣. 奥地利向何处去 [J]. 北京: 瞭望新闻周刊, 2000, (14): 62.
- [19] 张晓慧. 西欧极右翼思潮 [J]. 北京: 国际资料信息, 2003, (5): 23-26.
- [20] 李英. “勒庞现象”解读: 对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几点分析 [J]. 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3): 127-129.
- [21] 郝庆治. 荷兰 2002 年大选评析 [J].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主义, 2002, (3): 79-84.

(责任编辑:刘光磊)